

·历史地理研究·

从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风气 及其与地理学的关系

周振鹤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中心, 上海 200433)

[摘要] 晚明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使旅游成为一件正经事, 大批文人热衷于游览名山大川观察社会风情, 并蔚为时尚, 许多人写下描写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的文章, 其中突出者遂成为著名的旅游家, 个别超群者则成为杰出的地理学家。本文通过对明人文集中旅游文章的全面清理, 既从数量上也从见识方面论证了晚明旅游风气的形成过程, 并分析了地理学从历史学附庸的地位转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历史背景。

[关键词] 明人文集 旅游风气 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 K92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89(2005)01-072-007

中国历史上从来重视地理学的研究, 但与研究小学是为了解经一样, 研究地理是为了读史的需要。因而在正史中多数列有地理志, 独立的地理学著作则始终附丽于史部典籍之中。地理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可以两部重要著作作为标志, 一是徐霞客的《游记》, 一是王士性的《广志绎》。这两部大作是近世地理学观察、描写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的典范。它们突破了过去地方志式的对各地位置、幅员、山川、人口、风俗等内容的简单的、分类式的记载, 将作者对自然界与人文社会的缜密观察作如实的描写, 而且企图从中得出一般性的理论思维。徐霞客与王士性都生活在晚明, 他们的地理著作的出现并非偶然, 而是与当时社会的大变动有密切关系。他们两人是晚明旅行家群体中的出类拔萃者, 《徐霞客游记》与《广志绎》则是大量游记的特殊升华。关于明末的旅行家群体, 笔者已另有文章论及, 本文则专从明人文集来透视晚明普遍存在的旅游风气, 以表现徐、王著作产生的社会背景。

明人文集数量甚大, 所藏地亦甚分散, 好在近年来继影印《四库全书》之后, 连续出版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几部大丛书, 使得检索工作得到很大的便利。虽然迄今为止, 对明人文集的数量尚无确切的统计, 但经复旦大学等单位的初步普查, 已列出海内外明人文集有七千条(一种版本算一条), 有别集的人数为 3203 人。其中一人有别集数种者不多。如茅坤者, 一人而有六七种毕竟少数。即连三四种的也很少, 有的虽有两三种, 但分几种情形: 一是全集与选集之别(如徐阶有《世经堂集》又有《少湖先生集》, 不目验无法知道前者是后者的节选集); 一是全集与不全集之别; 一是刊刻者多, 名称改换, 似为两集, 实为一集。因无法一一仔细甄别, 故本文暂以著者数当文集数, 估计相去不会太远。

今将《四库全书》所收明人别集 238 种, 全部检索一过, 详细查阅者从台湾影印本第 1296 册郑善夫《少谷集》始。《四库存目丛书》所收明人别集 595 种, 亦全部检索一过, 从第 80 册以下, 则详细查阅。《四库禁毁丛刊》尚未毕全功, 从已出 121 册中查阅所收全部明人别集, 有 153 种。三种大丛

[收稿日期] 2004-10

[作者简介] 周振鹤(1941—), 男, 厦门人,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书中共检索明人文集总数近千种(实 986 种),则所目验已占明人别集近三分之一,标本很大,有相当的代表性。检索与详细查阅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明人文集中地理游记的大致数量与内容,并由此探明晚明旅游风气的基本特点。

旅游风气的普遍性与深刻性

晚明社会是黄宗羲所谓的“天崩地解”的时代,追求人的正常生活以至于个性解放成为文人的生活目标,因此许多文人不再将自己封闭在书斋里头,而是走向大自然,走向气象万千的社会,将自己融合在天地人群之中,有人并且以己为宾,以自然与社会为主,记录下来自己的感受,形成多种多样的,超越前人的精彩游记。这些游记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且越到明末,这类游记的数量越大,虽然其中仍然是大量的一般游记,但其中有一部分已成为独具特色的地理游记。

这些游记的数量大约有 450 篇左右,数量不小。牵涉到的作者约 115 人,约占检索明代作者的 1/8 弱,占明后期作者的百分比未作详细统计,但按比例至少当在 1/3 到 1/4 之间。其它 2/3 或 3/4 的作者并非不旅游,而是未有游记专篇,但仍有大量的旅游诗传世。更有个别人自称或人称好游,且所取字号也与旅游有关,但却无旅游诗文的制作的,如五岳山人虽以“五岳”为号,但并无五岳游记,只有五岳诗五首而已。这些人与前此各朝代热衷旅游的人差别较小。换言之,并非所有旅游者都能成为旅行家,而在旅行家中也只有极少数能成为地理学家。但非有金字塔式的构造,亦即非有普遍的旅游风气,非有大量的一般旅游者出现,则无由造就塔尖少量的旅行家以及更为少量的地理学家。

若以时期的特点而云,则正德以前的游记甚少,不过十来篇而已,而且即使有个别以游记为名者,亦无游记之实,如弘治十八年进士科的郑善夫《少谷集》卷十中虽有《春雨游大石记》、《夜游虎丘记》,类皆写景抒情之作,无关地理。嘉靖间游记明显增多,约有百篇,但多为小品,数百字而已,这些游记与一般普通以“记”为名的散文没有太大差别。至万历及天启、崇祯间,游记的写作甚为普遍,计有三百数十篇,有些“记”虽不以游记为名,也有游记之实。而且本文附录所选录游记篇目,嘉靖以前偏宽,万历以后偏紧,否则前后两个时期游记数量的悬殊更大。不但如此,明后期不少游记是长篇巨制。袁中道《珂雪斋近集》中所收之《东游日记》、《南归日记》皆万言以上,即小小之《洞庭山游记》在《水天阁集》中亦长至五千字,与嘉靖初之游记至多只上千字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又,明中期游记的题目多作某山记某水记,这些“记”只是静态描写,而到后期则作游某某山记游某某水记,进入动态描写,将自身介入于景物之中。这些差异都说明越到明末,旅游风气越炽,对旅游的精神投入也越多。

由于风气的变迁,许多人在文章中毫不隐讳自己的好游,如无锡人邹光迪说:“余故孱弱,少所济胜,不能游而独好游。……所过佳山水,未尝不游。盖尚平之于五岳,其天性然《郁仪楼集·游吴门诸山记》。”仁和人卓明卿道:“余性癖好名山大川,两浙形胜,车辙马迹且遍。”(《卓光禄集》卷三)但在明前期,这样的文字绝不可见,因为其时所谓旅游就是冶游,是为正派的读书人所不取的。而明后期则已出现山水朋友,出现山人一类的字号。当时以五岳代表天下名胜,所以以《五岳游草》为名的诗文集不止一部,自称五岳山人者不止一人,甚而有号十岳山人者。

比起前代来,晚明文人不但只是一般的好游,更进而耽于山水,好游成癖,甚而成痴。山水之癖是以山水景物为“自娱娱人”之极的表现,面对山光水色,表现出如醉如痴的极端状态。这是前所未有的所罕见的现象。在唐虽有游人,而多数留连光景,作为诗料,在宋游风已经稍杀为少数,在清代几乎萎缩到只有极少数人才热爱山水。而晚明却是登峰造极的好游典型。以下所述诸例,可谓一种代表。

袁小修在其《珂雪斋集》卷七《王伯子岳游序》中,甚至比况自己的好游是病态:“天下之质有而趣灵者莫过于山水。予少时知好之,然分于杂嗜,未笃也。四十之后始好之成癖。人有诤予为好奇

者。……疾病所驱势不容矣，予之于山林也亦若是而已矣。……今年夏晤伯子于仲宣楼下，则其山水之趣尤勃勃不能自己。……予虽好游，常以冗夺，而伯子游履所至，常淹留岁月，以济其山水之欲，则其清胜之具不啻数倍于予也夫？”袁是名人，故有文集传世，而如王伯子者，虽亦好游成癖，然无籍籍名，幸有袁为之作序，后人方得知晓。其时文人多有此类序，可见旅游之普遍。袁因好游，竟然“自戊申以后，率常在舟，于今六年矣，一舟散复治一舟。”

袁宏道刚辞吴县令，即“自春徂夏，游殆三月，由越返吴，山行殆二千余里。”（《与吴敦之》书）又说自己是“抛却进贤冠，作西湖荡子。”（《与张幼于》书）袁中道“生平有山水癖，梦魂常在吴越间。”（《游清溪记》）谭友夏在谈到钟惺的生平时说：“所至名山必游，游必逐日渊渺，极升降萦缭之美。使巴蜀，历三峡；入东鲁，观日出；校闽土，陟武夷。东南之久客如家，吴越之一游忘返。”（《退谷先生墓志铭》）而钟惺在明人中还不算游历最广者。

其时不但好游成癖，甚至还把山水当成乐生的一种需要。罗孚尹说：“对大江而饭，胃气达目，眼山川则腹溪谷，饭比常加倍。古人以乐侑食，能有此江光、石韵、松声、松响耶？”（《籥壁稿》）甚至将山水拟人化。王思任云：“秀颿所结，山水与文人共持之。山灵欲函文人，其言曰：吾不昵就子，而来饱子、醉子足矣。文人曰：尔贾也，我商也；我一见子；即挟子而行，常剖子之貌，摘子之神，夺子之趣，贩鬻于好事卧游之辈，而且奈我之不律何？”（《姚永言游笥序》）直以山水为人了。

当然应该注意到的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虽好游成癖，但仍以己为主，以山水为宾。是狎山水而娱己。因此心只在审美，心只在景色，而尚未及与科学搭界。到了明末徐霞客则发展为以山水为主，以己为宾，“以身许山水”，才会有科学的观察，才会进入不但足遍天下，即“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乃以一隅自限耶”（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而且达到以客观描写天下为己任的境界。但是如果没有全社会的好游风气，则造不成如徐霞客这样的人物以及科学的观察。因为对山水的景色描写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已经走到了极致，旅游中原地区已无甚稀奇，“其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百蛮荒徼之区。”也就是说，必须如徐霞客那样远走云南贵州，才算奇特，而且要从一般的喜好景色，进而“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徐霞客游记序》），亦即从娱乐进入求知，才算上了档次。

既然对山水之好是近乎狂热，则时人游踪之广之远，也是前所未有的，随便就有现成的例子：

除了上文提到的钟惺的游历外，侯廷珮在《御龙子集序》也历数自己的游踪：“自燕晋过西夏，道出葫芦峡口，径好水川，由陇汧度褒斜，登栈道剑阁，以达岷峨之麓，窥江沱之涯，造邛崃之境，而摄衣于犍为。……会西南用兵……尝自清水溪舶五九淋墓，顾黑田诸滩之险，梯凉山黑空梅子箐、青岗坪之危。……及珮奉銮部命改繁晋阳，己丑三月出蜀，径秦而入晋，……而珮复由汧陇达韦灵，过朔方群径唐吕温三受降城之南，由绥有而过鄜延，截西河以渡，东入太原，乃渭城之阳……及视事会邑……至于汧汾潞之寒雁，翔太行之赭霞，抚摩诘之遗墟，对岷峨之山月，憩霍山之孤松，览唐虞之芳躅，攀壶口之仙迹，挹首阳之清风。”

李濂在《乙巳春游稿序》中自述其旅游简历道：“余少厌尘嚣，雅尚丘壑。然家本大梁，苦无山水。间尝阅岳图、海经、洞函、岍录，辄嗒然坐忘，意驰神往。蚤岁宦游四方，每遇佳山水，必掉鞅以游，探奇穷幽，竟日忘倦。乃若京师之西山，襄阳之鹿门，湖南之大别、洞庭，京口之金、焦，吴门之虎丘，无锡之慧山，杭州之西湖，会稽之云门、天姥、若耶、剡溪，四明之天童、雪窦、阿育王山，台温之赤城、雁荡，河东之底柱、龙门，罔不逐眺览之愿焉。嘉靖丙戌免归，时三十有八，杜门扫轨不复远游。盖逾二十年于兹矣，乙巳暮春……入王屋蹶天坛观济源池，徘徊于龙潭盘谷之间……还经宁邑过山阳……遂入六真山……迤邐至百家岩、驼峰岭、石门潭，暂栖共城之百泉书院，爰陟苏门山绝顶，……兴尽而返。”

即在今日，这样的游踪也是够广够远的，不用说在四五百年前的明代了。顺便说说，李濂三十八岁以前所经地方不少，但无有游记。二十年蛰居不游，五十八岁之后又出游，则写了不少游记，他

的个人经历似乎反映了社会风气前后的差异。

对于人文社会的观察则与山水有所不同,而显得更加特别。山水之好是历朝历代都有,虽则有程度之异,尚非明代所特有,明代特有的只是将山水之好发展为对科学的追求。至于对人文社会的观察的爱好,则在明代为极突出之特例。正因为晚明社会追求人的正常生活,并把日常生活表现在文学作品中,视日常生活为人伦大事,摒弃假道学的空谈性命,冲破程朱理学的堤防,有了这样的基础才会对人文社会有细密的观察,并把社会风俗当成是研究记录的对象,并将如画的自然景色与社会的风俗融会在一起,在旅游的同时注意到人文世界。如袁宏道喜爱的不但是吴越的山水而且还包括吴越的社会。他游苏州虎丘不只是看风景,留连名胜古迹,而且特地挑选中秋佳节去观赏,要看的就是社会景观。那一天“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妇,下迨茅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特别是“歌喉相斗”,“清声亮彻,听者魂销。”后来的张岱比袁宏道更加癖爱岁时风俗,写下许多记实小品。浙江元夕的灯会,金山端午的龙舟竞渡,南京濮氏的雕刻,徽州的“天砚”,宜兴的陶壶,刘晖吉女戏,柳敬亭说书,龙山斗鸡,牛首山打猎,枫桥杨庙的“迎台阁”……无一不入其生动的记述。这样的观察与记录,事实上造成人文地理观察的基础,而且在这些文字里体现的地域性差异,实际上就是文化地理的表现形态。

类似这样从观察人文社会入手,而在文化地理方面表达自己特出见解的还有谢肇淛、屠隆等人。谢有《五杂俎》专书,内中对人文地理多有精辟的分析。注意到屠隆地理见识的人较少,但在《舆图要略后序》中,他也很有见地地说:“大抵西北风土硕厚,其人物敦大而淳朴;东南风土清弱,其人物韶秀而轻俊,此其大略也。秦晋雄险,其人壮悍(山陕);燕赵强大,其人慷慨(北直隶);齐鲁庞厚,其人椎朴(山东);河洛中土,其人冲和(河南);巴蜀险阻,其人峭利(四川);江淮澎湃,其人僂标(南直隶);徐沛战场,其人刚猛;荆楚广腴,其人迅快(湖广);三吴秀润,其人结浮;越国吴风,其人近靡(浙江);豫章瘠土,其人俭陋(江西);七闽饶沃,其人赋柔(福建);交广炎州,其人漫散(两广);滇南辽远,其人闲适(云南);贵竹僻绝,其人质野(贵州)。”这一大段话,实际上是先粗分全国为两大文化区,以东南和西北对立,再细划为十五区,与明代十五省大致相当而有参差。其中徐沛与三吴皆单独提出,而山西与陕西合,广东与广西合,这大概是时人比较一致的看法。接着又总结说:“盖土风从古如此,乃近代以来地气稍变,燕齐秦晋之间向称庞厚,近则朴渐趋华,拙渐趋巧,脂韦妙捷,有东南人不能窥其藩篱者。而东南间或有直戇西北风,又不可统一论也。”在相对稳定的文化地理格局中,又看出变化的趋势,不能不说屠隆的观察与分析是上乘的见识。

当然,对人文地理的解析,要以王士性为登峰造极,一部《广志绎》就是一幅晚明的人文地理图景,是地地道道的人文景观的记录(参见拙编《王士性地理书三种》前言)。可是持有类似片断观点并且表现在文集的并不止他一人,这正是旅游风气的兴盛带来的自然后果。正像地理大发现时代,使西方地理学跃迁到一个新境界一样,明代的旅游风气直接催生了地理学的独立。

旅游观点的变迁

明后期风气的转变 一直到明代中期,旅游还不被当成是正经事。湛若水可以说是看不起旅游的代表。他是弘治乙丑进士,著有《湛甘泉先生文集》32卷。在卷17《送谢子振卿游南岳序》中湛若水集中表达了他的旅游观点。他以为游有三种(按:实即三等),即形游、神游与天游。形游有具体游程:“如子之之楚,若干程过清远,若干程过连州,取捷径若干程至茶陵,访罗子钟,乃同子钟一泉若干程谒衡山守蔡百石,谒兵宪潘石泉;若干程抵衡山,又若干程入衡岳精舍,登祝融峰以息焉。此之谓形游也。”神游其实非游,主观唯心想象即可:“神游者心思之间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如妇之思一泉即到茶陵;仰企石泉白石即到衡州;怀精舍上封即是登祝融,此之谓神游也。”天游即道学,根本与游不搭界:“天游者与道同流天地万物同体,勿忘勿助之问,无在无不在之妙,不疾不徐,浑与道俱,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化故不滞,神故不测,无人而不自得,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

尔游行。此之谓天游也。天、神之游，惟振卿自得之”。很显然，湛若水以形游为下，以神游为上，以天游为上上。照他这样说，还要什么实质性的旅游，大家在心里想想就够了。这种观点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因为其时看一般旅游仍非高尚之举。所以延到明后期，李维桢还有“今天下薄游士”的话（《楚游稿序》）。

与看不起形游相对应的，还有人认为自古以来，有名的游士多是流浪失意的文人，为官作宦者不应与他们一样。不过以上观点到明代中期已在悄悄改变之中。李濂是正德甲戌进士，在其《嵩渚文集》卷九十，收有《答王参政论游览山水书》一文，就是专门反驳这种观点的：“（君）谓古人游迹传诸后世者多羁旅寄寓之士，而仕宦者恒无闻焉。……吾窃以为不然。古人杖屦所临，其迹不泯者，亦惟以其人之可重、言之可传云尔、而显融之与漂泊固在所弗论也。……不特览山水之奇变，纵目于风尘埃壒之表而已。公宁无意于兹游乎，乌摩人生斯世合志者希，讲学论文，天壤至乐。……伏冀俯鉴同心，裁度期约，则千里盍簪之朋，百年雨泽之益，不在古人，而在吾辈矣。岂非逸民之孤踪，斯文之雅集哉？”

到了明后期，旅游已变成一种“名高”之事了。谢肇淛在其《小草斋集》卷五《近游草自序》中说：“夫世之游者，为名高也。故尝远耽而近遗，其所谭矢注慕，在五岳八极、汗漫象罔之外，而跬步之岳壑，往往不能举其筴。余少也贱，束发之四方，所至名山大川，流赏几遍。东至海岱，西浮洞庭，北登碣石之宫，南揽白门之寺。吊和黍以伤悲，耽烟霞而忘返，二十年于此矣。而故乡往迹至或阙如。”

这时自然再也不把形游当成是下三等了，巧的是其时也同样有人将游分为三种，但却完全是另外的概念了。邹光迪在其《郁仪楼集》卷36《游吴门诸山记》中以自己的口气说：“邹生曰：夫游有三，一天游，一人游，一俗游。靡曼当前，钟鼓列后，丝幃延袤，楼船披靡，山珍水错，充溢圆方。男女相错，鬻而杂坐。涟漪不入其怀，清音不以悦耳，是谓俗游。天宇晴空，惠风时至，朗月继照，诸品一涤，枕石漱流，听禽坐卉，横槊抽毫，登高能赋，野老与之争席，麀麋因而相狎，是谓人游。无町畦，无畛域，审乎无假，挥斥八极，出入六合，挠挑无垠，乘风莽眇之鸟，而息夫亡何有之乡，是谓天游。余不能天游而大厌俗游，庶几人已乎。……夫山无尽而吾有尽，吾不以有尽无尽，则一往即百来，跬步亦千里也，是真方外之游。”这一认识，从根本上提高了湛若水所谓不上台面的“形游”的地位。

更有甚者，是把旅游抬高到至尊无上的地位。袁宏道甚至宣言：“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败兴也；游非其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与吴敦之》）

但一旦旅游成为名高之事，也就出现了各种人都来凑热闹的局面，以至于《游唤序》说：“若游者非文人才子，正如醉梦人，梦骨以为丘陵……俗儿自山迫欲归，归则愤愤如故者，何以异此。更有强作解人，漫无可否，每辄言佳，此山水中乡愿。”王穉山《纪游稿序》则盼望“游道少清”，曰：“昔游有二品，今加而三焉。贾之装游也，客之舌游也，而又有操其边幅之技，左挈贾而右挈客，阳吹其舌于风骚。而阴实其将于糗稿，施之于今而游道辱矣。”

更有人进而批评王公大人前呼后拥的旅游。陈继儒在其《晚香堂集·卧游清福篇序》中，以反话讽刺说：“余闻之，名山洞府，造物不付之冠剑车骑贵人，而私之隐君子。此语似有致而实否？否。夫王公大人之游，或侍宸舆、或领使节，屯军驻蹕，问俗褰裳。小有未济，则兵丁曹伍，腰镰负钺而前导之，能使目与足两无憾而后止。若蓬翟逸民，不过三尺筴与一履屐耳，历览几何而辱之曰游。则不得不退寻纸之上之陈迹而指数之曰：是某水是某丘。若置其身于空青钝碧之间，以稍自宽云耳。则卧游编者，冠剑车骑贵人可无，而隐君子不可不有也。且山游之难，我知之矣。”

旅游风气的转变从上面的不同论述可以看得很清楚。

人与旅游对象的关系 对于旅游的功能，最普通的是认为旅游能有助于诗文的写作，这是从古

以来的观点。人若不旅游则文辞枯涩,写景拙思。上面所说“游道日广,知益日多”就是这个意思。当然旅游还有开阔心胸的作用,这也是从来的认识,只不过明人将这点说得更加明白罢了。《逍遥园集选》中的《题吴汝震西游记卷》就说:“大抵北士不游南,其文词不丽。南士不游北,其览眺不雄。”这从侧面也点出了南北山水之异,一秀丽一雄浑。雄浑的景色可以开阔心胸,所以万历壬辰进士毕自严在《石隐园集·三叟同游记》里说:“从来宇内名山大川可以开辟胸臆,陶冶性灵。……士君子未有不以登选奇胜搜讨灵异为愉快者也。”

开阔心胸显然是为了个人的满足,其在明代的发展,就是追求旅游的适意。李开先将这个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人生贵在适意,适意不在奇;人生难在会心,会心不在远。然非奇远不足以雄大观而肆遐踪。……但正甘钟鼎者以山泽为枯槁,耽超旷者譬市朝于桎梏。盖乐生之性均,而殉物之情异也。予自韶年游序,即欲窃仁智之好,而轻仕进之心。将激清流以濯纓,躐高冈而振响。及履仕途,官户部,在京则皇陵诸山无不历览,而西山尝两至焉。出使则北居庸,西太白、终南、贺兰皆其所尝身之者,及在吏部随驾至承天,陪祭显陵,五岳望其二而登其三……罢官后屡约江午坡、罗念庵、吕江峰、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诸相知,同游荆之武当、闽之武夷、江右之匡庐、浙东之天台雁宕、川巴之峨眉剑阁。予以懒病不果往,罗、唐、熊、王四子虽未尽游,然已如约矣。每有书来,矜炫且蒙讥弹。予惟叹羨之已耳,甘受之已耳,追悔何及哉!”(《李中麓闲居集·游龙藏洞记》)李氏为嘉靖己丑进士,游龙藏洞时在嘉靖24年,时好游已渐渐成风,李氏之文描写亦颇详细。不过其出游似皆因公之便,即当时所谓的宦游。至于罢官后的私游则托“懒病”了。

方鹏也说:“……(诸人)觴予曰:游观之道贵乎冥搜邃讨,往而忘返,乐而忘疲。二君倏去倏来何其兴之高而情之寡也。予曰不然,烟霞泉石之趣,功名利达之怀,虽清浊雅俗之不同,其癖一耳。慕之切则累吾心,玩之专则丧厥志,吾适吾意而已,不可贪也。”(《娇亭存稿》卷5《游张公洞记》)看来适意之游是当时不少人的想法。

既为了适意,则冶游也无可厚非,所以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序》里直率地说:“客有病予此书多述游冶之事、歌舞之谈,导欲宣奢,非以长化也。予则以为志者,史家之一体也。史不实录,则观者何稽焉?故秦华、终南,守国者恃为金汤之固;武夷、雁荡,栖真者隐为解化之区;岳麓、鹅湖,讲学者辟为都授之所。西湖三者无一居焉,而欲讳游冶之事、歌舞之谈,假借雄观,只益浮伪尔,史家不为也。”这些话后面的潜台词就是,杭州这样的地方就是应该让人来冶游的。这一思想给王士性以直接的影响,王在《广志绎》中就公开地将杭州的旅游业作为正业来看待,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当解放的思想。

将山水与我合为一体,但以我为主,而以山水为宾,这是较普遍的观点。谢肇淛《小草斋文集》卷4《游燕二集自序》云:“夫山水吾自有之,则吾主而山水宾也,吾借之以供杖履焉。赏谐而心会,一再游足矣。吾敬不自有之,而以还之天地,则天地无尽,而代吾有之者亦无尽,吾以倏然忽然之身,过其隙如山猿、海兔,老且死焉,不知其足也。不然者是其摩崖而頌,蜡屐而登,歔歔堕泪,而欲托焉者,尚未改色而白杨累累,已成劫灰矣。”《陈伯孺游草序》则曰:“夫游之难,游而有所受焉之难也。灵阙足以会心,陈迹足以兴感,流揽足以畅耳目,啸咏足以俟千秋,伯孺于是为不廉矣。”

既以我为主,以山水为宾,则山水之奇不奇就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问题了。以故沈懋在《环溪集·奇游漫记序》中说:“环宇内称山川之奇者不为少也,然奇不在山川,而所恃以为奇者,岂不以人哉。今夫好游者遇有名胜,辄挾词摘藻,非不人人能,然以余所覩记,率多留连光景,凌虚驾空而侈言无当。此其游,即日在岩壑中与泉石为侣,而万无所裨益。人固病其达且放矣,余窃伤之。”

但上面已提到,以我为主还不能成为地理学家,至少不能算是科学意义上的地理学家,充其量只能是传统型的地理学家。这在当时也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除了以上主要观点外,明人对旅游还有其它一些形形色色的看法。

如认为喜好旅游实际上是一种求异的心情在起作用。丁奉说:“览胜山川者好其异焉耳,厌平

地则好异域,厌常时则好异景,然而两者不相值也。”(《南湖先生文选》卷7《游都湾石洞记》)王一心在《兰雪堂集·风尘记余自序》中也说:“夫人日处故土,耳目所习,即海市蜃楼,亦以为海上平常物耳。一之四方则见一似人者不胜惊且喜,而况怪怪奇奇为予所不见闻者乎。予于是觉吾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皆海市蜃楼也,则不能不记。”

又如认为风景名胜的标准是:“山水以相遇而胜,相敌而奇。长瀑大溪介于瓯闽之山,细若绅带矣。江湖大壑中虽有孤屿绝岛泛焉若沓,此有以相遇而非有以相敌。善乎蔡昇氏之言。”(《陶文简公集》卷6)《胡庄肃公集·游武当山记》又云:“凡山水之胜,大都有四:有以其实,有以其人,有号侈而实否,有实美而名之,斯亦所遭云尔。”

再则对旅游的方法也有新见解:邹迪光《始青阁稿·游天台记》云:“余出游率以仆从杂沓、奚囊郑重,多所不便。乃于童奴汰去惰者、弱者,衣履汰其华者,行李汰其不急者,从客汰其倦游者,轻装薄囊。”该文集的《台雁草自叙》又认为游须有具,又须有笔。笔比具更重要。这种看法十分重要,故明末游记特多,而前期虽有游而少游记,非不为乃不能也。写游记并非容易之事,无准备,无思想,是写不出来的。至于游诗,一般的人都能凑几句,所以明人文集中,游草特多就是这个原因。

又,魏文焮乃嘉靖甲辰进士,其《石室秘抄》卷五《桂林杂纪序》云:“国家承熙洽之运,寓内奠安,文武臣僚得以其暇怡情山水之胜,游心翰墨之场。”认为天下太平是旅游兴盛之原由,也有一定道理。

以上这些观点虽有水平参差与见识高低的区别,但说明整个社会盛行的好游之风,已经促使许多人对旅游这一事物进行认真的思考,将其上升为人的生活中必须认真对待的正经事。这是明代社会,尤其是晚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最后还有一点必须提及,那就是《四库全书》所收明人文集多头巾气,理学冬烘,绝少纵情使性之作,而且游记都特少,且篇幅都不大。除了王世贞的《四部稿》中有数量稍多的游记外,其它几屈指可数。包含大量游记的明人文集主要在存目书与禁毁书中,多是一些独立特行的文人所为。由此亦可见乾隆时期编辑《四库全书》时的取向——清人又后退到以旅游为非正经事了。其后果也是明显的,即清代再未出现过明末《徐霞客游记》与《广志绎》这样的巨著,地理学变成单纯的经院的文献考证了,虽然在这方面产生了不少杰出成绩,但以观察描写为主的地理学却萎缩后退了,这正是后来中国地理学落在西方后面的直接原因之一。

附录:明人文集游记篇目选录,因受篇幅限制已删。

The Traveling Fashion in Late Ming Dynas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Geography: A Research on the Anthologies of Literators in Ming

ZHOU Zhen-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Great changes of fashion in late Ming Dynasty turned traveling a serious business. It was then quite popular that lots of literators were keen on traveling around famous mountains and rivers or having a look into the social phase. Many people had written to describe natural and human landscapes. Among them, those who did good job became great travelers and those especially preeminent ones distinguished themselves as geographers. Through a roundly research on the anthologies of the Ming literator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how traveling became a common practice in late Ming in view of the quantity of the traveling notes and the knowledge-accumulated records. In addition, it also analyze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when geography surfaced as a independent discipline by breaking from history.

Key words: anthology of Ming literators; traveling fashion; geography

[责任编辑 周珉]